

## 极权的镜像：美国左派对中国的误读与容忍

周晓/余浩风

此访谈做于 2024 年 10 月。周晓系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余浩风为《中国民主季刊》编辑。

余：周晓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民主季刊》的采访。您在《左祸百年中国国殇》中撰写的文章《美国对中国极权统治的错误认知》深刻反思了美国在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的理解偏差，尤其是对极权主义的认知错误。能否请您简要介绍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

周：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回顾了中美关系近百年的历史。我认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认知存在一系列严重错误。而这些错误正在对全球自由与民主价值造成了深远影响。

首先，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认知错误，是西方最大的战略失误之一。以毛泽东为例，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政界曾经对他的革命情怀充满浪漫化的幻想，忽视了他所推行的政策所导致的大规模暴力和饥荒。同样，邓小平也被西方误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英雄，甚至将其与里根和撒切尔相提并论。然而，事实上，邓小平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本质立场，是“六四”镇压的直接决策者。西方未能看清，这些中共领导人并未推动政治自由化，反而巩固了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

其次，文化相对主义助长了对中共的容忍。文化相对主义使得西方对中共极权主义采取了辩护态度。这种意识形态削弱了对自由民主核心价值的坚守，为中共的罪行提供了某种正当性。

再次，美国错失了两次反思中共的关键机会。1949 年和 1989 年是两次反思的重大时刻，却因麦卡锡主义和对经济接触的幻想而未能深刻批判中共的本质。这种认知上的妥协让中共借机巩固了国内统治，并挑战国际秩序。

最后，西方政策反而助推了中共的崛起。从经济援助到技术支持，西方帮助中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忽视了其背后巩固极权的动机。这种错误不仅强化了中共的内外统治，还使自由民主秩序遭受更大威胁。

余：您的文章提到，美国的“文化相对主义”与对共产主义的部分认同，似乎导致了某些左翼群体对中共极权的宽容态度。您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哪些左翼观点或思想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的认知？在您看来，美国的左派在理解中国的极权统治方面面临哪些典型的误区？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您能先定义下美国的左和右吗？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美国的左派是其民主党吗？

在回答之前，我想先澄清，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并不能简单地划归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美国的左派并不只代表民主党，而是一系列广泛的群体，包括社会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人权倡导者和环保主义者等。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推崇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社会平等。而右派则更多强调自由市场、小政府的理念，同时在移民政策和文化议题上更为保守。

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我将欢迎中国走向资本化，并依照美国及西欧强国的路线进行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定义为左派。

至于美国左派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宽容，我认为这可以追溯到几个深层原因。首先，文化相对主义在左派中广泛存在。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共的一党专制是一种“文化差异”，而不是一种需要批判

的极权主义。许多人甚至将毛泽东的革命浪漫化，认为它代表了某种对社会平等的追求，却忽略了暴力和镇压的代价。

其次，左派对经济全球化的支持也助长了这种宽容态度。他们曾希望通过经济接触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化，但实际结果却是，中国利用了全球化的利益巩固了自己的专制体制。这个误判至今仍然在影响美国左派的对华政策。

另外，左派在理解中国的极权统治时还存在几个典型误区。比如，部分宗教左派未能意识到中国对新疆和西藏等地少数民族的压迫，反而相信中共营造的宗教宽容形象。好莱坞和一些左派文化机构为了经济利益向中共妥协，允许中国政府审查内容。这些行为，不仅削弱了民主价值的传播，还进一步为中共极权背书。

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些左派支持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甚至将其视为控制人口的全球贡献，但忽视了政策对中国妇女权利的压迫性影响。这种选择性失明，是左派在批判极权时缺乏一贯性的表现。

余：在您的分析中，您是否认为美国左派的某些政策主张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更为宽松，从而间接地助长了中共的极权统治？具体来说，哪些思想或行动让美国在对华政策中失去了对人权和民主的重视？

周：以克林顿家族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推动了混合市场经济和全球自由化的政策。他们相信，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中国的政治自由化。这种理论在逻辑上看似合理，但在实践中却忽视了中共的本质。中国并没有像他们设想的那样通过经济开放迈向民主，反而利用全球化积累了经济和政治资本，强化了极权统治。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选择性忽视，试图通过“接触”和“合作”政策换取经济利益，而这实际上为中共在国内外的扩张提供了支持。

部分美国知识分子和左派思想家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平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对红色高棉等极权暴行选择性失明。这种浪漫化为中共的一党专制提供了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例如，当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效仿毛主义实施大规模屠杀时，<sup>1</sup>一些左派人士对此选择性失明，比如米达尔在访问红色高棉后宣称未见“恐怖场面”，甚至接受荣誉学位，这种行为等同于为暴行背书。<sup>2</sup>

部分左派对中共的“大寨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自力更生的象征，甚至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这种推崇忽略了大寨模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极权主义剥削本质。杨振宁的例子尤为典型，他对“农业学大寨”大加赞赏，称其是“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完全忽略了这种模式对基层农民造成的沉重压迫。这种不加批判的推崇，进一步削弱了对中共极权统治的国际批评力度。

余：您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在1949年和1989年后的两次关键反思未能彻底扭转对华政策方向。回顾几十年的接触政策，您认为这种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在民主化方面停滞不前？您会如何评价福山、克林顿等学者和政要的观点，即认为经济繁荣会自然催化中国政治开放和民主化的论点？

周：我认为几十年的接触政策本质上低估了中共对民主化的敌意。美国在经济合作中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会自然催化政治开放。然而，中共利用这些合作，不仅通过技术转让和市场开放推动了自身经济发展，更通过操控教育、媒体和意识形态，进一步压制国内的民主诉求。例如，中共以“主权权利”为借口打压人权问题，并通过反美宣传，成功塑造了一个“外部敌人”，以维持内部的极权稳定。这些手法直接瓦解了接触政策的初衷。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经济繁荣会推动政治开放，这种观点显然低估了极权政权对权力的执念。克林顿等人也曾乐观地认为，通过全球化和经济接触，中国将步入自由化的轨道。然而，事实却是，中共在经济上大获其利，却在政治上进一步收紧。中共并非如福山所设想的那样，愿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权力的分享和转移。相反，它通过经济繁荣积累的资源，用于强化监控和镇压机制，为其维持极权统治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共的本质在于将个体工具化，而非将人视为目的。它玩弄“人民”这一抽象概念，将个体利益和权利置于统治者的意志之下。这种对人性的漠视，恰恰是民主化无法在中国发生的根本原因。民主的核心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体，而中共的治理逻辑与此背道而驰。它既不允许独立的思想空间，也不容忍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美国未能在 1949 年中共建政后，及时认清其极权本质。1989 年“六四事件”后，美国再次错失对华政策的调整机会。相反，美国过于依赖经济接触，忽视了对中共本质的批判。克林顿时期推动的中国加入 WTO，以及随后几十年的对华投资，直接为中共巩固经济实力提供了支撑，却未能推动任何政治开放。

余：多位学者指出西方国家的接触政策忽视了中共对外界压力的抵御能力，使得经济增长与政治开放脱钩。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在接触政策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是否真正低估了中共强化政权控制的决心？

我认同这一观点，即西方国家的接触政策低估了中共对外界压力的抵御能力，使得经济增长与政治开放脱钩。这不仅是战略上的误判，更是对中共极权本质的一种轻视。

西方接触政策的核心假设存在两个经典误判：其一是认为中国加入 WTO 后会融入国际社会，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二是相信开放西方互联网技术会瓦解中国的言论管制，进而推动民主化。这些想象一厢情愿地忽略了中共的本质及其统治策略。

中共通过**统战策略**，联合党外渴望改变现状的贫农等力量，在国内外构筑支持体系。几十年的统战和农村革命使其击败党内外反对者，巩固了极权体制。而接触政策下，美国等国家对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渗透力认识不足，为其战略性地利用全球化打开了大门。例如，西方品牌与中共的经济合作导致技术转让，却未能触及政治改革。这使得中共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继续控制国内言论和社会自由。

美国左派媒体与学术界对中共的罪行选择性忽视，甚至默许和支持，导致西方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根源模糊和无知。这种“意识形态贫困”源于对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长期漠视。结果，劣质的左倾理论如批判性种族理论（CRT）等成为主流，为中共的渗透创造了舆论环境。例如，左派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推动的抗议活动及商家标语文化，虽聚焦种族正义，但未能触及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批评，反而使得更深层的价值讨论被忽略。

此外，中共利用**华人社团百人会、华侨协会、华文学校**等渠道在海外持续推广其意识形态，渗透西方社会。这些组织表面上致力于文化交流和华人团结，实则服务于中共的宣传和统战目的。

接触政策从基辛格的“接触、合作”到克林顿的“影响、改变”，一路稳步推进，但并未有效扭转中共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共以“韬光养晦”伪装成民主前奏，却实质上继续通过剥削国际体系巩固极权体制。这些策略使得中共在经济增长与政治控制之间实现了深度脱钩，展现了对外界压力的极强抵御能力。

余：近年来，去风险化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接触政策，试图通过减少依赖关系来降低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与接触政策相比，您认为去风险化战略的主要优势在哪里？其是否具备扭转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潜力？若没有扭转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潜力，是否意味着中共的政治模式已在全球供应链和经济联系中取得某种结构性优势？

我认为去风险化战略的主要优势在于：1) **风险管理**：去风险化能够有效管理与中国在经济与技术合作中可能带来的风险，降低对中国产品和技术的依赖，减少由此引发的安全隐患。2) **战略性评估**：通过重新评估现有的依赖关系以及潜在的风险，可以识别并迫使中共远离国际主流高科技领域，从而削弱其在全球技术生态中的影响力。

我认为，去风险化难以直接扭转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国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更倾向于用计谋取代契约精神，这种传统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互害模式”，而这种模式最终会导致双输的局面。那些意识到问题的人往往选择离开中国，但在当前缺乏法治的环境中，我看不到体制改革的可行前景。

中共目前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模式充满高成本和低效益的隐患。他们往往选择一条缺乏经济效益的技术路线，最终推出的科技产品无法形成商业价值，甚至可能带来负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不得不依赖公共财政的持续输血，这实际上是在重走苏联的老路。更严重的是，这种模式可能会将中国推向“一国一套”的封闭系统。我认为，这就像“点错了科技树”，一旦走上这样一条封闭的技术路径，中国的科技发展将不可逆转地越来越落后，这不仅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也将长期阻碍技术现代化的进程。

余：一些批评者认为，去风险化虽然在经济上寻求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缺乏清晰的政治或人权目标，使得其效果有限。您是否认为去风险化可能反而强化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阻碍中国国内改革势力的成长？

我认为，去风险化的确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中共的民族主义叙事，并进一步阻碍中国国内改革势力的成长。然而，这并非西方政策的直接结果，而是中共，特别是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推动的激进民族主义和一党专制权力集中的延续。事实上，在西方提出降低风险之前，中共已经在主动构建民族主义叙事，将外部批评视为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挑战。

自2016年特朗普总统任期以及中美竞争加剧以来，中国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体现在持续增加的军费开支上，也体现在对外展示军事力量和增加冲突风险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与此同时，国内改革势力已经无法对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集权化权力结构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尽管经济不景气可能对中共内部的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定压力，但我认为习近平始终能够利用外部压力作为政治工具。例如，他经常将西方遏制中国的政策作为中国经济疲软的解释，从而巩固其在党内的支持。这种逻辑不仅帮助他转移了经济困境的责任，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共内部的集体共识：维持政权的生存优先于一切，包括经济增长。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只要中共掌权，中国就不太可能发生重大的政治变化。

余：特朗普总统时期的对华政策显得更为对抗，但对民主化议题关注较少。一些学者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对华打压在短期内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但未能提供任何对民主、人权的长期支持。这种“经济优先”的政策是否可能反而削弱了美国对中国内部民众和改革派的吸引力？

我认为特朗普和拜登都缺乏一个全面且长期的对华战略。

过去，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精英，普遍寄希望于通过深化贸易和经济关系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然而，这种希望在实践中破灭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仅没有带来民主和法治的转变，反而赋予了中国更大的能力去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崛起的中国逐渐对自由世界构成威胁，例如在乌克兰问题、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以及对俄罗斯的支持。

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加剧了美国公司从中国的撤离。我认为，这种撤离确实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尤其是在削弱中共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对中国私营部门也会造成打击。私营部门的萎缩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内部改革派和市场化力量的生存空间，使得民众对外部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更难转化为现实。

总的来说，我认为缺乏民主化和人权目标的“经济优先”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短期削弱了中国经济，但却没有形成对中国民众和改革派的吸引力，甚至可能在客观上为中共的叙事提供了助力。

余：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中国国内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也让中国精英对美国价值观产生质疑。您认为特朗普时期的对抗性政策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中国社会对民主的兴趣？

我认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政策确实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复杂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对抗性政策明显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许多中国民众将其视为对中国的打压，从而强化了对本国体制和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一些中国精英对美国的价值观产生了质疑。他们开始思考，自由主义市场价值和民主价值观在全球竞争中的适用性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

以芯片产业为例，这是一个高度全球化和分工明确的领域，同时也是科技、资本和市场高度密集的行业。在这样一个充分竞争、创新不断涌现的行业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甚至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掌控整个产业链。即便是中国，在芯片领域也难以摆脱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而特朗普时期以高关税和“卡脖子”技术封锁为代表的政策，特别是在芯片领域的打击，可以说精准打击了中国经济的关键命脉。这种手段让中国意识到其技术短板，同时也迫使中国产生更强的技术自主化倾向。

从对民主的兴趣来看，我认为这种对抗性政策在短期内可能削弱了中国社会对美国民主价值的吸引力。对于一些中国人而言，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似乎削弱了自由主义市场的普适性，也让部分人对民主模式的信心下降。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挑战可能也会促使中国内部产生更多关于制度优劣的反思，尤其是在技术和市场领域的压力之下。

余：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始终存在价值观（人权与民主）与实际利益（经济合作）之间的矛盾。您如何看待一些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过度关注自身经济利益，忽视了对中国民主化的推动？未来，您认为西方是否能够真正将“去风险化”战略与推动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有效结合？

周：西方国家在对华政策中长期面临价值观与实际利益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接触政策的实践中尤为突出。我认为西方过度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对中国民主化的推动，这一评价并不为过。美国从欢迎中国加入 WTO 开始，至 2016 年，一直试图通过“接触、合作、影响、改变”的方针，将中国塑造为国际秩序的合作伙伴。然而，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落到实处的只有“合作”，而“影响”停留在形式，“改变”更是无从谈起。

美国商界将大量订单交给中共，使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中国新兴市场的出现不仅刺激了西方的经济欲望，更中断了其对中共极权本质的反思。经济合作的巨大利益让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共的压迫行为时选择沉默甚至纵容。批评者所说的“过度关注经济利益”，实质上是西方在价值观上妥协的结果。这种妥协，让人权与民主的核心价值被边缘化。

接触政策的核心假设是，通过和平演变和渐进式的社会变革，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化。西方曾寄希望于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通过“精神和心理的力量”推动政治变革，然而，中共的行为证明，这种期待过于天真。中共在全球化过程中巩固了经济实力，却未曾表现出任何开放政治的意愿。事实是，中共通过强化对内的控制与对外的统战策略，成功回避了民主化的压力。

面对接触政策的失败，西方逐渐转向“去风险化”战略。去风险化的主要优势在于，它通过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降低了中共对西方经济体系的杠杆威胁。然而，仅靠去风险化不足以推动民主化。推动人权和民主价值观需要西方在战略设计上更为坚定和清晰。具体而言，去风险化应结合以下几点：

1. 强化规则与法治

将去风险化与推动法治建设结合起来，在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同时，通过国际规则的强化，迫使中共更透明地参与国际合作。

2. 平衡利益与价值观

西方必须重新审视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关系。在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同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例如对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以此表明对核心价值观的坚持。

3. 重建国际联盟

通过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协作，共同推动对中共的压力，减少单一国家面对中共时的脆弱性。

余：在对中国的认知中，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误判的根源？如何平衡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避免这种认知上的偏差？

周：西方政策制定者在对中国的认知中，受“文化相对主义”影响，犯下了严重的战略误判。文化相对主义试图通过悬置价值判断来尊重不同文化，但这一方法论在面对中共这样的极权主义

时，却成为其操控的工具。西方政策中的这些偏差，既有思想根源，也有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首先，文化相对主义的倡导者，包括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受制于自身内生性问题的不满，转而寻找毛泽东和中共的“替代方案”。这些人对中共用“平等”口号团结被压迫者、砸烂旧世界的革命行为，寄予过高期望，却忽视了乌托邦主义实践的残酷后果。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中共的极权实践，都清楚地展现了这种浪漫化思维的危害。

其次，西方将中共的极权治理视为“文化特色”，忽视了其意识形态根源。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误用为历史发展的“定律”，中共则以此为理论依据，消灭私有制，推行极端的社会实验。这种以“消灭旧世界”为目标的暴力理念，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真实反映，而是植根于西方的乌托邦传统。文化相对主义者未能辨析这种差异，反而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提供了借口。

中共善于利用西方的文化相对主义，通过伪装其意识形态，模糊西方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例如，它以“主权优先”为借口压制人权问题，同时将经济发展包装为“特殊国情”的结果，规避国际社会的批评。这让许多政策制定者相信中共的独特性，并将其视为可以合作的伙伴，而不是必须抵制的极权体制。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西方“自负的知识阶层”滥用理性主义，试图通过科学主义和建构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开放，但忽视了中共通过经济发展巩固权力的能力。这种错误认知，导致西方对“和平崛起”论调和韬光养晦策略毫无防备。

### 如何平衡意识形态差异，避免认知偏差？

#### 1. 明确意识形态边界：

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中共的极权主义本质，避免将其行为误解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与意识形态是两码事，中共极权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体现，而是对马克思乌托邦主义的工具化。

#### 2. 回归普世价值：

人权与自由是不可妥协的底线。西方必须回归《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体现的核心价值观，抵制文化相对主义削弱这些原则的影响。

#### 3. 强化批判性思维：

西方知识界需要审慎分析中共的宣传策略，特别是其用“和平崛起”包装极权本质的手段，避免再次被其话语逻辑误导。

---

<sup>1</sup> 派翠克 (Heuveline Patrick)：《死亡率危机的人口统计学分析：以柬埔寨为例，1970-1979》，《强迫迁移和死亡》(Forced Migration & Mortality)，2001，(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US)，第 102-105 页。

<sup>2</sup> 华纳·韦斯卡里 (Werner Wiskari)：《瑞典作家参观波尔伯特控制下的柬埔寨》(“Swedish Author Tours Pol Pot's Area of Cambodia.”)，《纽约时报》，1979 年 10 月 14 日。

<https://www.nytimes.com/1979/10/14/archives/swedish-author-tours-pol-pots-area-of-cambodia-no-horror-stories.html>